

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經濟、政治 的改革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及挑戰

Comment on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of Chi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 the Adjusting and Challenge of Foreign Policy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朱新民

Zhu, Xin-m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譚偉恩

Tan, Wei-en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mment on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of Chi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 the Adjusting and Challenge of Foreign Policy

Zhu, Xin-m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n, Wei-en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China adopted the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in 1978, it has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by joining World Bank, IMF, GATT and WTO. This policy has made China's economy get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ts people can have better situation of life. Nevertheless,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trade section transformed China into one big threat in American and its neighbor's view, which gave China the very difficulty and challenge in Foreign affairs now and beyond.

In light of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1970's to now,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profitable and the futile effects in China's policy of joining economic regime. Relying upon this, the paper submitted a comprehensive critiqu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studying up the theory of trade peace, this paper also surveyed the affection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o China, and used this result to explain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its partner in trade.

We think, when China enjoys his economic progress, it should have,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e considerate and pragmatic perceptions of reducing the suspicion about its rising and threat. And furthermore, China ought to take the peaceful strategy for his main part in foreign policy. All of the this can help himself to catch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in the future 20 years and get more advantages to become a really great power.

Keywords:

Economic Refor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Reform and Open, the Theory of Trade Peace.



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經濟、政治 的改革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及挑戰

朱新民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譚偉恩

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隨著跨國商業活動的迅速發展與勃興，國際間「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度日增，「經濟」議題儼然成為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一面向之一，並與安全議題共同成為國家對外事務的兩大主軸。另一方面，冷戰的結束促使「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與「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受到國家的重視，成為彼此間往來的「規範」及主要場域。中國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即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目標，逐步融入「國際經濟建制」(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參與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會(IMF)、關貿總協定(GATT)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全球或區域性的「國際經濟建制」，使得二十五年來中國的經濟得以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相對獲得提升。然而，經濟發展與貿易互賴雖然使得中國國力及國際政治的影響力日增，但卻也讓中國成為區域鄰國及美國眼中的「威脅」或是「敵手」，為中國當前及未來的外交處境形成了一定的隱憂和挑戰。

本文回顧1970年代末期迄今中國在經濟改革上的重要歷程，分析其過去與現在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得與失，就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作一整體的評述。同時探究中共政權內部，因經濟改革後在政治上所做出的調整與轉變。另外，透過對「貿易和平論」(the theory of trade peace)的探討，檢視經濟互賴對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藉此說明即使現在的中國與許多國家存有密切的互賴關係和貿易往來，但並非意謂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在享受參與「國際經濟建制」所帶來的豐碩成果之餘，應該以更具創見的思考及務實的認知，化解各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在外交政策的主觀面與客觀面表現出和平崛起的風範，掌握未來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strategic opportunity)，在「國際經濟建制」中替自己爭取更多成為大國的優勢。

關鍵詞：

改革開放、經濟改革、貿易和平論、國際經濟建制



壹、前言

藉由經濟政策的改革和逐步開放，中國漸漸融入「國際經濟建制」(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與「國際貿易體系」(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使國家獲得了發展的機會。此種發展除了對美國商業的利害關係影響至為重大外，對渴望追求經濟成長的其他國家而言，也同樣具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一方面，中國市場宛如一個潛力與利潤無窮的新天地，儼然成為全球競爭的輻湊之地，各類大型跨國公司無不設法在此爭逐市場佔有率，成為立足全球的國際性企業。但在另一方面，此種因貿易和經濟活動產生的「互賴」(interdependence)現象，並非全然如「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學者所言，在基於利益而產生互動的各個國家中，只在乎一種目標，即達到本國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和基於利益而生的「互賴」合作模式中，國家只重視用什麼方法才能使自已獲得最大的收益。¹知名國際政治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將他提出的「互賴」觀點建立在國家本質是屬於一個「個體主義者」(individualist)的假設基礎上。他認為，「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就像經濟學中的商人或企業主，是理性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者。因此，在理性的自我主義觀念下，一國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利益是沒有關聯的，也就是說國家只重視「絕對獲益」(absolute gains)。

然而事實上，伴隨「互賴」而生的「相對獲益」(relative gains)問題一直是左右國家間合作或衝突的一個關鍵，基於「相對獲益」

1. Axelrod, Robert M.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Y: Basic Books, 1984), pp.14~16 ; Stein, Arthur A.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30~139. 斯坦(Stein)使用了一個絕對獲益的觀點，即「自由主義但非重商主義的自我利益觀」，來表明國家只關注他們本身的獲益並以自己的獲益最大化來衡量結果。



的思考，國家有可能在擔心今天合作的伙伴因為在過程中得到相對較多的好處，而逐漸在能力上超越自己，成為明日威脅自己安全或生存的敵人，而退出現有的合作關係，甚至不惜以發動戰爭為手段，進行「互賴」關係的調整與修正。這也正說明了為何改革開放後一個在經濟上逐漸進步的中國，會成為美國或亞太區域國家眼中潛在的「威脅」，即便這些國家也與中國一同在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過程中有所受惠。²根據一些學者的看法，中國正呈現一種非常危險的態勢：繁榮的經濟使其對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大。當其經濟越成長，社會更加富裕的同時，對於能源的需求自然也將更為迫切，這很可能使中國把更多的預算與經費投入軍備，因為這樣才能確保在任何情況發生時，能源的供應無虞。³

類似上述的觀點，以及目前為各國所熱烈討論的「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en)，無疑都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外交政策提供了相當的困境。本文研究之重點有二：一是嘗試從中國的經濟改革談起，對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正、反面效果進行分析與評估，說明參與「國際經濟建制」是中國求取持續發展和成為大國的不二法門，但同時也應積極設法消除「互賴」過程中鄰國內心的疑慮，避免合作「互賴」關係的中斷，或是實際衝突的發生；另一重點則是由中國先前的計劃經濟占絕對的主導地位，轉變為今天的非計劃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情形來分析。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在不斷推進，但是，在經濟市場化的同時，其政治制度卻沒有出現政治學理論中所預測的民主化。中國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沒有隨著經濟市場化而持續走向民主，可能有幾個原因：一是在經濟由計

2. Bernstein, Richard., and Munro, Ross H.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Random House Date Published, 1998); Pumphrey, Carolyn W. edited. *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3. Calder, Kent E. "Asia's Empty Tank,"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2 (1996), pp. 58-59.

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渡階段，政府官員的權力成為有利可圖的工具，因此他們不願放棄自己手中的既得利益，放手從事政治改革。另一個原因則是，當經濟改革獲得一定的成效時，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減輕了對中共當局進行政治改革的壓力與要求。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共最高領導核心的結構呈現出一種如下的發展趨勢：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是個十足的獨裁者，一個人說了算；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雖然幹練，但也不得不跟陳雲這樣的元老抗衡，使得中共政治權力的結構實際上出現了兩個中心；到了第三代，江澤民則是面對更多的抗衡者，於是派系問題浮現；到了胡錦濤、溫家寶這一代，集體領導、黨內派系之爭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民主化是否有可能藉由中共黨內派系間的權力制衡而產生，即值得觀察與研究。

最後在國際層次上，中國當前的外交政策，除了在客觀面要落實安鄰、睦鄰和富鄰的政策外；主觀上和平崛起的善意表達以及理性形象的建立，⁴也是中國未來在國際關係活動中應謹守和堅持的原則。

貳、中國的經濟改革

1978年年底，中國開始發動經濟體制改革，邁向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國認知到，唯有跳脫中央計劃經濟制度的窠臼，國家未來的發展才有實現的可能。本部分將介紹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為了融入「國際經濟建制」所做出的相應調整及其所歷經的三個階段。另外，筆者也提出了對中國未來經濟改革必須輔以政治革新的觀點。

4.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中國科學院。〈<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12/25/0112.htm>〉



一、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因

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已歷經了二十餘年的快速增長。雖然各方人士對這段期間的增長率究竟是多少存有不同的看法，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明顯加快、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改善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餘年中保持著令人矚目的成長？這些因素在今天的中國經濟體系中是否依然存在？有無發生變化？這些問題的釐清將有助於吾人分析和預測中國未來經濟的前景。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從改革前（1953~1978年）的6.1%上升到改革期間（1978~1998年）的9.7%。⁵這段期間，中國藉由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使資源得到適當的分配及利用，從而帶動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的發展、促進了非國有經濟的成長、國內投資結構的改善和外資的引進、對外貿易的擴大等，使得中國經濟能以高速度成長。中國方面的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改革期間的經濟成長既不是「投入帶動型」，也非「技術帶動型」，而是基於資源重新配置所產生的現象。表面上改革伴隨著生產率的提高，但其內在的真正原因是改革導致的資源優化分配，提高了改革過程中的生產力。⁶

在資源優化配置的措施之下，改革期間的生產要素投入、體制革新、結構調整都從各方面帶動了經濟成長，本文透過相關文獻的整理，羅列出以下四個在改革期間帶動經濟的關鍵因素：

5.「新中國50年系列分析報告之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輝煌」，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gb/index.htm>〉

6. 學者們認為，如果把農業到非農業、鄉村到城市、國有企業到非國有企業的勞動力移轉均考慮在內，同時評估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轉移效果，則中國二十年的改革期間由於資源優化配置而對經濟成長產生的貢獻約有1.5至2個百分點。參考：王小魯、樊綱，**中國地區差距：20年變化趨勢和影響因素**（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頁95。



1. 農村實行工業化

改革開放的二十餘年間，約有一億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這是相當驚人的農業工業化規模。鄉鎮企業的快速增長一直被中國官方認為是國民經濟成長的直接動因，經濟學者王小魯認為，農村工業化是改革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在1981至1992年間，單就農村經濟中的勞動力和資本從農業轉向鄉鎮企業的重分配過程，就促進了1.4個百分點的經濟成長。⁷

2. 國內儲蓄與投資

資本累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在1985年以後，國內投資率便保持在38%上下，到了1993前後，更是維持在40%。另外，有學者表示，改革期間有許多的儲蓄被轉化為有效的投資，而不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變成大量累積的「存貨」。⁸改革期間中由於投資體制發生變化，市場對投資的主導作用開始顯現，間接促進了經濟成長，其中儲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可輕忽。

3. 貿易出口

經濟迅速國際化是改革二十多年中一個顯著的結構性變化，出口額從1978年不到GDP的5%上升到1997年的20%。中國商品出口額按美元計算，年平均增長率為16.7%，在同一時期內可以算是各國中的首冠。另一方面，出口商品的本身也出現了結構性的調整，工業製成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重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之間，大幅升高約75%，可以說十分地驚人。由於改革後的中國發揮了經濟上的比較優勢，改善了資源配置的效度，使得1990年代後，外貿由逆差轉為順差，出口遂成為提升經濟成長的另一主因。⁹

7. 王小魯，「農村工業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王小魯、樊綱主編，**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頁53。

8. 邊裕淵，「中國大陸金融深化之研究」，**遠景季刊**，第五卷第二期（2004），頁3~28。

9. 趙建東，「中國的貿易和機遇」，發表於**2004中國貿易出口金融研討會**（上海：全球貿易評論主辦，2004年6月1日）。

4.外資的進駐

外資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貢獻在學者間有不同的看法，但是1997年後大量進駐或引入的外資對於生產力提高的促進則屬確實。據估計，1992年以後，外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約為1.4個百分點。¹⁰

二、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定下翻兩番的經濟發展目標，預定每年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為7%的時候，全世界幾乎沒有人相信中國有能力實踐。當時中國有8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且其中文盲占了多數。這麼大的一個農業國家，加上極低的發展水平，卻真的達到持續每年7%以上的增長速度，¹¹迄今二十餘年！

中國經濟改革，是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期間雖然經歷了1989年前後的政治波折，但經鄧小平力挽狂瀾，並以1992年「南巡講話」為轉捩點，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再度重新得到確立。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更是在所有制理論和產權理論上取得重大突破。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不斷獲得完善。改革開放理論的創新直接反映到政策決策和改革實踐中。¹²二十六年來，中國經濟實力已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高速發展，創造了一項成為大國的條件。

1.第一階段：1978年12月至1984年10月

從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革經濟體制，到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段時間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階段。此一時間的改革重點在農村，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完成由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向家

10.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Survey: Business in China, Behind the Mask Mar," *Economist.com*. <http://www.economist.com/displaystory.cfm?story_id=2495113>

11. Li, Ling.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Cato Journal*, No. 18 (1998), pp. 147~151.

12. 「鄧小平視南巡講話」，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www1.people.com.cn/GB/33831/33837/2535034.html>>



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過渡。在農村改革不斷深入的同時，城市改革也以擴大企業經營上的自主權為主要內容開始進行。為了使企業擁有一定的資金，並逐步「規範」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中國政府對企業先後實行了利潤留成、盈虧包幹等政策。¹³

到1980年代初期，由於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共將發展重心放置於輕工業和加工製造業。但從1982年開始，隨著第六個五年計劃的確定，中、大型的基礎建設被排入時間表，而重點則是置於能源與交通建設項目。不過由於當時投資金額低，交通與運輸等基礎建設的發展十分緩慢，能源工業的投資額雖然有較快的增長，但仍趕不上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整體經濟需求。由於能源供應不足，發展成果上受到了限制，因此從1983年開始，中國加強對能源與交通的投資，並募集「國家交通能源重點建設基金」，使得該年之後的基礎建設投資額逐漸呈現上升的局面。¹⁴

2. 第二階段：1984年10月至1992年10月

從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改革重點是由農村轉向城市，而內容則包括了：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增加企業（特別是國有的中、大型企業）競爭力，使其逐步自主經營、大幅減少指令性計畫和直接定價的商品數量，以促進市場體系的形成和完善，並逐步改變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方式，即由直接管理成為間接管理。¹⁵而在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上，先後實施第二步的稅

13. 所謂利潤留成，就是把企業實現的利潤按一定比例在國家與企業之間進行分配，打破計畫經濟體制下企業實現利潤全部上繳至國家再決定如何分配的制度。而盈虧包乾，就是根據企業的盈利或是虧損情況，實行對利潤或是虧損的包乾。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頁247~258。

14. 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321。

15. 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479~505。



改和承包經營制度。¹⁶

1986年3月，中共公布了第七個五年計劃，要求在基本建設的投資上要比第六個五年計劃為高，特別是能源、交通、通信等領域的比重。由於此段時間各投資主體的積極響應，使得基礎建設的投資成長率增加的相當快速。¹⁷進入九〇年代，中國邁向第八個五年計劃，此段時間是中國成立五十年以來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也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增加最快的時期。1992年在鄧小平視察南方經濟建設情況之後，各地紛紛成立經濟與技術開發區，進行招商和吸引外資。為了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國家和各地政府在能源、交通和郵電等基礎建設上投入大量的資金，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¹⁸

3.第三階段：1992年10月迄今

以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四大為分野，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¹⁹1993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方向。主要內容包括：²⁰(1)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2)建立及培育市場體系，同時發展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3)調整政府職能，建立完善而宏觀的經濟調控體系；(4)對內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對外則加強貿易經濟體制改革，同時擴大開放的程度；(5)加強法律制度的完備。

為了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4年1月之後，中國在宏觀經濟體制變革方面推出一系列的措施，例：統一稅率，實行

16. 所謂第二步利改稅，就是國家設置不同稅種，不同的企業向國家繳納其中的幾種稅，稅後利潤原則上全部留給企業使用。

17. 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322。

18. 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324~329。

19. 施哲雄主編，**發現當代中國**（台北：揚智文化，2003），頁211。

20.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頁27~65。



央行與地方分稅制、開放主要工業產品價格、實行匯率併軌制等。在企業改革部分，則係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採取捉大放小、資本優質組合等措施。199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十五大上又進一步提出加強企業技術進步、鼓勵兼併、下崗分流、「規範」破產制度等措施。²¹

三、小結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在物質層面、體制層面還是法律制度。當前中國的改革正進行著兩個目標的轉換：一個是從「經濟」發展朝向「人」的發展轉變；另一個是從「經濟」上的改革朝向「政治」運作模式的轉變。事實上，在改革開放的這段時間，中國大陸一方面經濟層面在發生轉變，一方面政府層面也在發生變革。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政治體制，即由政府主導型的改革，已不可能完成政府本身的革新與進步。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必須訴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幫助。誠如中共總理溫家寶所說，一腿長一腿短是站不穩的，僅有經濟體制變革的單腿改革已經不能再持續下去，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需要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條腿來相配合。²²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將先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變遷做一說明，最後再從經濟面向切入對近二十餘年的改革開放政策進行評析。

參、改革開放後政治結構的轉變： 中共政治改革的歷程與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內部即存在著兩股相互對峙的政治勢力。

21. 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頁137~164。

22. 此為2003年11月21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紫光閣接受華盛頓郵報總編唐尼的採訪時，所作的表示。「溫家寶談台灣和西藏問題等」，**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http://www.zyztb.cn/zytzbwz/newscenter/zhongyayaolanun/80200311250074.htm>>



一是自由派的政治勢力，他們以民主、自由為號召，要求進一步加快市場化經濟，並藉由擴大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革來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另一股勢力則是傳統派的保守人士，這些保守的左派堅持舊計劃體制下的意識形態，主張對社會生活實行嚴格的控管，甚至主張恢復文革以前的計劃體制。²³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以知識份子為主軸的自由派構成了解構舊秩序的力量，而後者則構成推動政治緊縮的力量。此兩種力量均力求透過影響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威權中心來取得對政治的主導權。它們彼此間的消長過程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當局政治發展的主線。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八〇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可被視為最能代表這兩股政治勢力衝突走向白熱化的三個階段。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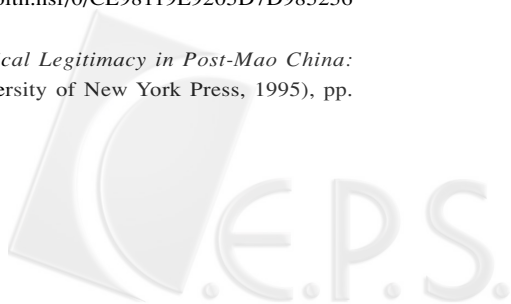
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中，吾人所觀察到的中國政治變化現象，是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自由派和以傳統意識形態為理念的左派均在政治上被逐漸邊緣化，而由具有威權主義特點的技術官僚取得了主導政治的地位。為什麼中國政治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本部分將試圖作一簡略的分析。

一、兩極政治勢力與政治中心的互動關係

從1978年到1989年，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識份子與學生為主體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識形態官僚為主體的保守派這三者之間便長期存在著複雜的周期性互動關係。從政治互動模式來分析，1980年代後中共當局的政治光譜並不是簡單地只有左、中、右

23. Zhang, Allan. "China's New Leadership Rolls Out Its Reform Agenda,"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http://www.pwc.com/extweb/newcolth.nsf/0/CE98119E9205D7D985256E2800760ABE?OpenDocument>>

24. Chen, Feng. *Economic Transili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Ideology and Refor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 26~33.



三種政治勢力，實際上當時的政治結構是呈現一個以鄧小平為中心，向保守和激進兩個端點漸次延伸的多種「派群」共存的結構。²⁵大體上，可以根據對舊體制的喜惡程度作為排序依據，把對中國政治具有實質性影響的1980年代政治精英群體納入到下圖來加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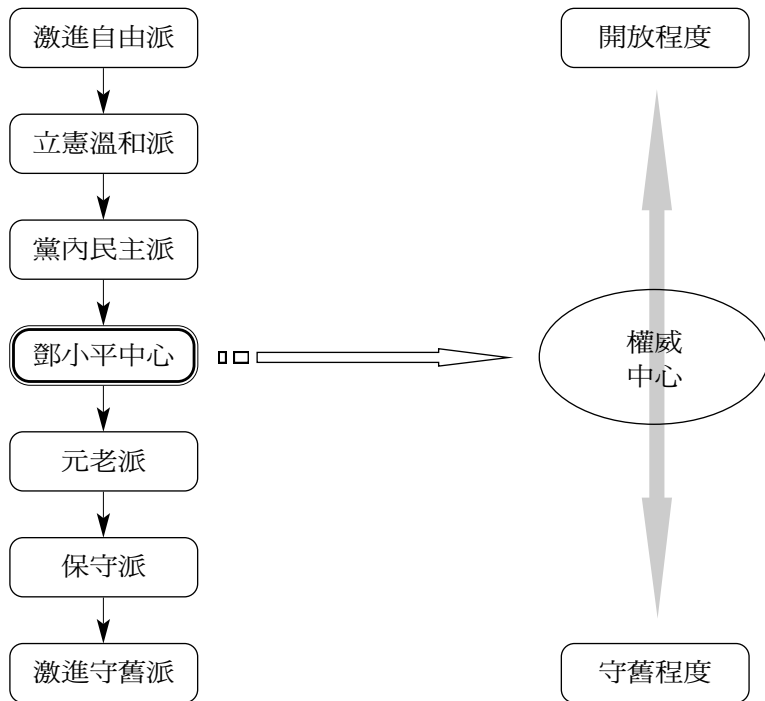


圖1 1980年代政治精英群體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25. Breslin, Shaun. "Chin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From Plan to What?'"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http://www.psa.ac.uk/cps/1995%5Cbres.pdf>>



如圖所示，最下面的是保守度最高、與舊體制和傳統意識形態最具親和性的官僚。而所謂的元老派是指相對務實但仍然強烈維護黨的一元控制系統的官員，如陳雲、彭真、王震等人。中間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政治中心。在這個中心裡最接近鄧小平的是以胡耀邦、趙紫陽等先後擔任中共總書記的政治次中心，他們作為黨內開明派的代表人物，被鄧小平委以實際操作改革政策的重擔，但並不具備最終決定權。²⁶在「鄧小平中心」的上方，依次是黨內民主派（如朱厚澤、胡啟立等人），接著就是主張在體制內加快民主化建設的知識份子立憲派，在這一光譜的最上面一塊，就是知識份子與學生為核心組成分子的自由主義激進派。²⁷

在這個政治光譜的兩個極端與鄧小平的政治中心之間，則有若干緩衝型政治團體。通常這些團體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遠比兩個端點的勢力要大得多。在1980年代末以前的相當一段時期內，左右兩側的勢力並不強大，而在自由激進派與「鄧小平中心」之間，存在著體制內憲政民主派、黨內民主派，以及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的次中心，他們的功能在於聯結並緩衝、協調「鄧小平中心」與自由派知識份子之間關係的作用。²⁸這些緩衝團體曾是1980年代中共政治中的實際操作者。而在政治中心與保守派人士之間，則存在著元老派作為中間的緩衝者。元老派的主流傾向接近於保守派，其中也有部份人較為同情自由派，他們在不同時期發揮了協調不同政治勢力的作用。當然，這些被稱為政治派別的群體彼此之間並沒有涇渭分明的界線，也沒有明確的組織形式。

根據這一政治光譜吾人可以推斷，中共政治的互動過程可能存

26. 伊銘，「中共新的權力三角」，早報網。〈<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ongress16/pages/congress16151102g.html>〉

27. 伊銘，「中共新的權力三角」。

28. 朱蓓蕾，「中國大陸的制度轉型與社會變遷面臨之問題」，遠景季刊，第一卷第三期（2000），頁79-84。



在著兩種不同的前景。其一是政治權力中心將立場較不突出的兩側團體結合成自己的新勢力，形成以自己為中心而兩極趨弱的政治結構，壓抑左右兩極，迫使兩極之間形成平衡，從而維持其政治上的主導地位。這種情況是1980年代前半期中共政治發展的特點。²⁹其二是激進派與保守派形成日益激烈的拉鋸狀態，各自主導部份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處於這兩端之間的各政治派群則不得不根據自己的利益與觀念各自向兩極靠攏。一旦出現這種兩極化政治結構，力求在兩端之間維持平衡的中間派將兩面受敵，最後必然逐漸失去政治影響力並被迫邊緣化；政治發展一旦進入了這種狀態，很容易出現危機。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共政治的實際走向就是逐漸在保守與激進的兩極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中間各層趨向兩極的「中弱兩極強」的結構危機。³⁰於是，激進者越來越激進，保守者越來越保守，1989年天安門事件即是最佳的例證。

這時處於不利地位的是那些屬於次權力中心的人士。一方面，他們作為開明的改革派，不願意對自由派表現得過於強硬。因為這會影響到他們在民間的形象與威信。另一方面，如果他們不能表現得足夠強硬，就會面臨「喪失立場」的指控，失去政治中心的信任。隨著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與次中心之間出現裂痕，次中心的部分人士最後便成為自己軟弱態度的犧牲品。³¹那時，保守派認定次中心的代表人物「喪失立場」，「鄧小平中心」則認定他們軟弱無能。胡耀邦、趙紫陽就是在這種兩面受敵的困境中先後被迫下台的。次中心的邊緣化反過來也會對鄧小平的政治中心產生衝擊。1989年春夏之交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後，趙紫陽的出局，使鄧

29. 王懷超，「中國政治體制改革24年」，*理論動態*，第一五九五期（2003），頁14~27。

30. 王懷超，「中國政治體制改革24年」。

31. 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1），頁68~71。



小平失去了與激進派之間的緩衝屏障，不得不直接面對激進派的挑戰與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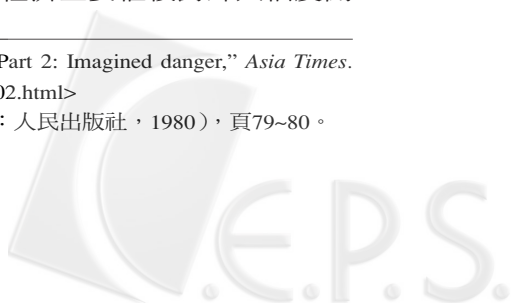
二、1990年代的政治格局與變化

1990年代初，當自由派與黨內民主派被邊緣化以後，趁勢而起的保守派在部份元老派官員的支援下，借助「反自由化」而獲得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在政治上極為活躍，力圖成為主導中國政治的新勢力。為此，他們以「反和平演變論」與「兩種改革論」來作為政治復辟的意識形態戰略。「反和平演變論」主張「孤立合理」。它強調，外部世界及西方文化的邪惡勢力將會改變中國，所以中國處於受害者地位；作為受害者的自衛反應就是把自己與從邪惡勢力主導的外部世界隔絕開來；³²因此，對外封閉與自我孤立便被說成是中國人自衛與生存所必需的手段。這一觀點還啟動了二分法的思考，並把它延伸到經濟領域；美國與西方具有先進工業文明的「現代化」國家因而被定義為帝國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宣傳本身與鄧小平主張的經濟對外開放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另一個保守派的意識形態戰略是「兩種改革論」，它把改革區分為資本主義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革，兩類性質根本對立的政治範疇；而它主張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革其實不過是在社會主義架構內自我完善，因此，1978年以來經濟改革中幾乎所有從西方學來的新事物都被歸入資本主義改革的範疇而遭到排斥。³³這實際上也就否定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路線。

在保守派崛起的情況下，鄧小平意識到這股勢力的威脅性。於是鄧藉由「南巡講話」作為與之抗衡的起點。「南巡講話」的基本精神是在保持政治格局不變的同時，經濟上要繼續對外大幅度開

32. Liu, Henry C K. "The Struggle for Harmony, Part 2: Imagined danger," *Asia Times*.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EF14Ad02.html>>

33. 孫健，*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79~80。



放，要通過經濟發展的實效來保障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並且提出了反左優先論，從而削弱了保守派在天安門事件以後已經獲得的政治優勢。³⁴鄧小平還特別提出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不要爭論，用以剝奪在意識形態已經取得優勢地位之保守派的話語霸權。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只是保守派被邊緣化的開端。事實上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黨內保守派仍然具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他們利用他們掌握的報刊，發表反對改革開放的觀點，試圖繼續影響高層政治。保守派的真正失勢是在1990年代中期，那時不少守舊的元老過世，或由於年齡原因而退出政治舞臺。³⁵結果，長期以來影響中國政治生活的左派保守勢力從此失去了他們的政治依託。另一方面，經濟市場化導致人民觀念的轉變，年輕一代對主義和信仰逐漸失去了興趣。因此自1990年代中期之後，左派反對勢力後繼無人，隨著鄧小平時代的結束，保守派已不再是左右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關鍵因素。

特別說明的是，左派勢力消退的最重要原因乃是主張激進西化的自由派勢力的消退。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發展，由國家供養的知識份子生活條件大幅改善，知識份子在市場經濟與政治控制相結合的新社會結構下，比其他階層獲得較多的利益，於是政治態度逐漸趨於溫和。³⁶許多原本對政治壓抑不滿的知識份子也獲得可以選擇出國留學或是進入黨工作的機會，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分流也減輕了對當局挑戰的壓力。自由派被邊緣化之後，保守派失去了對手，因而也失去了價值。「南巡講話」以後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新興中間階層的崛起，它主要由各級政府中的技術官僚、民營企業家、高等院

34. 鄭永年，*政治漸進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台北：吉虹資訊，2000），頁54~55。

35. Chen, Feng. "An Unfinished Battle in China: The Leftist Criticism of the Reform and the Third Thought Emancip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158 (1999), pp. 447~467.

36. Li, Cheng. "China's Political Succession: Four Myths in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http://www.fpiif.org/commentary/2001/0105chinamyths_body.html>



校教授、律師、外資企業中的白領階層，以及體制內得益的傳媒工作者等人士構成。他們作為現存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反對激進的自由主義，擔心政治改革會危及他們的利益；當然，他們也不可能支援保守派的意識形態，因為保守派主張恢復的社會主義也同樣會剝奪他們已經取得的利益。因此，他們認同技術官僚的威權統治，希望在現存威權秩序下繼續謀取利益。而這些人也正是中國目前威權體制中的真正核心力量。³⁷

三、後兩極化與新型權威主義政治的形成

在本部分最後，有必要對兩極化的中共政治結構進行分析。1990年代初期以後，中共的政治結構可以稱之為是一種「技術官僚的新權威主義時期」，經濟改革已經使社會生活逐步多元化，「三個代表」的入憲，象徵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已經擺脫了傳統意識形態的平均主義思考。³⁸因此吾人認為這是一種後極權時代的新權威主義。是一種由非意識形態化的技術官僚及知識份子和專家所共同主政的新權威時期。

後兩極化的意義在於，它使「新權威」不必再受到左右兩極政治勢力的強烈干擾與影響而具有了穩定性。到了1990年代後期，由於政治結構上終於擺脫了兩極政治壓力的干預，權力中心具有了充分主動權，使得中共的新權威主義政治逐漸成熟。在這種新權威主義體制下，以社會經濟分工為基礎的社會自由空間，將會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取得實質性的發展。經濟發展是推動中國政治走向民主的最有效動力。市場經濟給予中國人的自由，將是未來政治走向民主的溫床。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多元化以及契約性的交

37. Gilboy, George J.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83, No.4 (2004), pp. 33-40.

38. 徐小鳳，「三個代表與政治改革中的兩個問題」，*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二期（2003），頁12。



易規則，將是中國人學習民主的來源。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經濟好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會成為民主政治的推動者；另一方面，農村民眾的切身利益，也使他們對村自治抱持著更積極的態度。而主政者在不受意識形態原則支配的情況下，他們也會從「功能」意義上對民主化過程採取較為務實的態度。這並不意味新權威主義的執政者會自動成為民主化的積極推動者，但是在沒有政治風險的情況下，他們會更趨於用理性來考慮中國民主建設的前景問題。雖然這一條件下的民主制度及政治改革是相當有限的，但至少使得中共的政治民主化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肆、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

1980年代的中國，逐步調整其與西方資本主義間的對立，努力爭取成為國際貿易與金融等各項經濟建制的一員。同時積極謀求國內經濟體制的革新，1997年亞洲的金融風暴，使中國開始贏得國際間的正面評價。現在的中國已是「國際經濟建制」中不可獲缺的一員。³⁹

一、從內而外的開放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這次會議開啟了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大門，擺脫了以往閉門造車的鎖國政策，確立了對外開放的發展戰略。⁴⁰吾人可以說由此開始的往後二十年，是中國經濟由封閉走向開放和逐步確立世界貿易大國地位的黃金時期。

中國的貿易進出口額，從1978年的兩百零六億四千萬美元增長至2001年的五千零九十八億美元，每年平均成長15%。⁴¹中國對外

39.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5 (1996), pp. 40~45.

40. 施哲雄主編，**發現當代中國**，頁151~152。

41. 「國家統計局報告」，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10-03/26/228946.html>>



貿易在世界的排名，從1978年的第三十二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六位，佔世界貿易額的比重達3.2%。對外貿易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國民經濟中的外貿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2000年的44%，⁴²其中出口總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由4.6%上升到22.7%，進口總值所佔比重則由5.2%上升到15.8%，這一切在在顯示對外貿易在中國的經濟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何其重要，同時也對中國何以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建制」提供了一項有力的說明。

二十多年來，中國在對外貿易體制上持續地進行改革，基本上已經擺脫了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經營、高度集中、政企不分的舊制，逐步減少了指令型計劃經濟，而以關稅、匯率、信貸等經濟制度來間接調控國家對外貿易的管理方式。以下針對幾點重要的變化，略作說明：⁴³(1)進出口商品結構逐漸優化。原本以食品、農作及原油為主的初級產品，出口幅度下降，工業性成品的比重則是逐漸上升；(2)外商投資增加。外資已成為當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和國家經濟成長的最主要支柱；(3)貿易市場進入多元化發展。在整個世界貿易中，中國出口的商品品種較少，渠道偏窄且集中，極易導致他國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為此，在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對美國、日本、歐盟、東協等傳統重點市場出口的同時，中國已開始積極拓展新興市場，並加快外貿主體多元化後的管理體系。設法引導中、小企業在取得進出口的自營權後，能適應國際經濟規則與國際競爭環境。

42. 在人口眾多、內需為主的大國，外貿依存度一般不會過高。以經濟發達的大國如美國來說，根據聯合國公布的網路資料計算外貿依存度，在2000年為20.7%，日本為20.1%。但這一年中國外貿依存度卻高達44%左右，遠大美國、日本等經濟大國一倍。雖然考慮到匯率、較大規模加工貿易等因素，中國貿易依存度是有被高估的可能。但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逐年增高卻是不爭的事實。

43. 江小涓主編，**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報告（No. 1: 2002~200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40~157。

二、與「國際經濟建制」的「接觸」

與中國相關的全球經濟體系建制主要可分為兩大類群：一是金融建制；一是貿易建制。前者主要是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MF）為經緯；後者則是以世貿組織（WTO）作為主軸。其他區域性的經濟組織，如亞太經合會（APEC），在使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方面，也發揮著相當重要的功用。這些制度和組織在與中國互動的過程中，以一種「接觸」（Engagement）性的戰略，使中國漸漸融入世界經濟。⁴⁴

1.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1980年，中國先後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最初的運作是由中國主動發起的，一方面謹慎的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進行協調；另一方面在國內展開一系列的政策變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設法淡化文化大革命所遺留的負面影響，決定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的首要目標，同時結束原本自給自主的經濟模式，建立起相互依賴的合作經濟觀。⁴⁵

在中國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的這些年，雙方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已經被穩固的確立，許多的合作項目（特別是與世界銀行資金相關的項目）都有十分豐碩的成果。另外，中國本身經濟的逐漸市場化，使它更加適應這些組織中的運作「規範」（norms）與「國際經濟建制」。在有協議簽訂的情況中，中國的履行能力與實施記錄可以說是十分地良好，無論是在償還貸款還是遵守世銀的約束性條件方面，表現均受到高度的評價。⁴⁶

2. 世界貿易組織

44. Johnston, Alastair I., and Ross, Robert 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Y.: Routledge, 1999).

45.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台北：元旦出版，1999），頁83。

46. Itoh, Fumio.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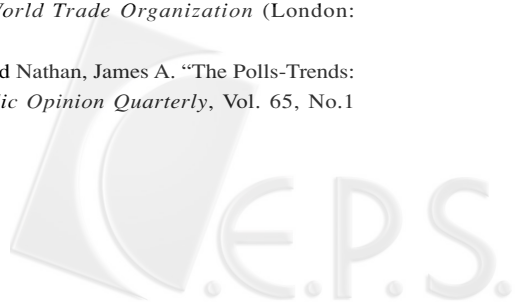


自1995年起，中國開始積極設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而言這是一項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高難度工作。1982年，中國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世貿的前身，即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1986年中國申請全面加入關貿總協定，自第二年起正式開始入關參與談判。正如同加入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一樣，申請加入關貿總協定的主要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於政治目的，毋寧，中共領導人希望中國能在台灣之前先行加入該組織。1988年，中國在申請加入關貿總協定上取得了進展，該組織與中國進行談判的代表在雙方爭議的問題上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有關中國最初加入關貿總協定的草案中，並未要求中國因為成為關貿總協定的締約方而必須接受市場原則。⁴⁷但是隨後於次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使得中國的加入進展受到嚴重影響，同時也令美國將中美雙方的貿易與人權問題相掛鉤。由於美國與中國逐漸惡化的雙邊貿易赤字，使得抑制中國的勢力在美國逐漸抬頭，導致中國在此段時間的談判中，無法以較為寬鬆的條件加入關貿總協定。⁴⁸

進入1990年代後，有關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的談判似乎變得更為棘手，因為除了先前天安門事件的影響外，美國也一直或多或少的扮演中國「入關」過程的守門員。在所有雙邊協定中，與美國的雙邊協定最為重要。一個身為世界軍事與經濟的先進國家和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相互關係上必定是會有一些衝突。所幸，最終雙方認知到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彼此有需要也應該建立一種合作的關係，才能有益於各自的利益及世界的穩定。1999年11月，在雙方領導人，江澤民與柯林頓（Bill Clinton）的直接推動

47. Holbig, Heik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p. 173.

48. Holbig, Heike. (2002), p.188; Tien, Charles., and Nathan, James A. "The Polls-Trends: American Ambivalence toward Chin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5, No.1 (2001), pp. 130-133.



下，為期六天的談判過程終於達成了一個雙贏的協定。⁴⁹隨後，中國與歐盟在2000年5月達成協定。並與其他國家進行獲准進入雙邊市場的談判。2001年9月13日，中國與墨西哥達成協定，從而圓滿結束中國「入世」之後的雙邊市場談判任務。⁵⁰

加入世貿組織兩年多來，中國為使和世界的貿易與投資往來更為便利，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瑞典國家貿易委員會（Swedish Trade Council）主任彼得·克倫說：「中國政府正在履行自己的諾言。」⁵¹ 2003年6月25日，瑞典國家貿易委員會公佈一份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評估報告認為，中國在適應世貿組織條款方面有重大進展，超過世人原先的期待。報告認為中國已進一步開放了商品貿易和勞務市場，降低了關稅、取消了價格管制並修改了很多規定和條款，不過在地方保護主義問題方面，還有努力的空間。⁵²

三、小結

總結中國實施了長達二十餘年之久的經濟與貿易改革，以及其後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表現。本文認為豐沛與廣大的市場、富有活力的私人企業、以及跨國公司與外資的大量投入，是造就今日中國經濟起飛的三項重要基石。⁵³雖然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水平時高時低，但中國的出口額一直保持著良好而穩定的增長態勢，特別是能歷經席捲亞洲的金融風暴而不衰。回想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包括日元在內的絕大多數亞洲貨幣紛紛貶值。當時，大多數經濟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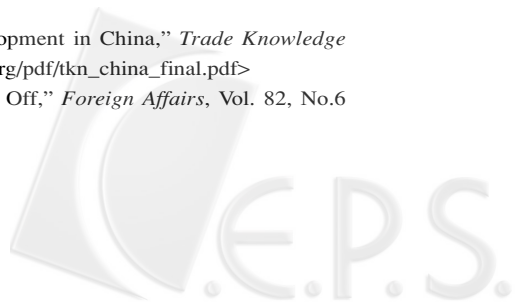
49. Holbig, Heike. (2002), p.107.

50. Holbig, Heike. (2002), p.254.

51. "Swedish Trade Policy," *SWEDEN.SE*. <www.sweden.se/templates/FactSheet_____6366.asp>

52. "Final Report on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rade Knowledge Network*. <http://www.tradeknowledgenetwork.org/pdf/tkn_china_final.pdf>

53. Hale, David., and Hale, Lyric H.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6 (2003), pp. 36~37.



和評論家聲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將受到嚴重削弱，人民幣也勢必下貶。然而，事實是人民幣最終保持了穩定，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各國對其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為穩定匯率所做出貢獻的高度評價。⁵⁴

過去，中國經濟所以落後的重要原因是經濟體制缺乏開放性；現在，透過全方位的開放，經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中國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資，引進大量先進的技術，並開闢了經濟成長所必須的廣闊國際市場。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閉關鎖國，只能導致落後；改革開放，才能夠利用國際上的資源、資金、技術和市場，來支持中國經濟的發展，落實鄧小平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的國家戰略。

55

不過在融入「國際經濟建制」的過程中，未來有兩種可能的發展係值得吾人予以關注：⁵⁶(1)重新鎖國的傾向；(2)過度開放的傾向。前者，往往係與西方國家政治上的敵意，以及由此引發的民族主義情緒有關；⁵⁷後者，則與西方強國（特別是因與中國貿易而受惠的國家）的壓力、自由放任的國際貿易學說有關。這兩種傾向所可能引起的影響將是深遠的。重新閉關鎖國，勢必將使中國失去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沒有了經濟發展，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將會受到質疑；⁵⁸而過度開放，雖然可能為中國創造更多的財富，以及強化在國際上的地位，但是很可能招致政治上的不安全。因為當今世界的經濟秩序與政治秩序是密切相關的。中國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紀中

54. Pesek Jr., William. "China's own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aipei Times* (Mar 17, 2003); Halloran, Richard. "China's Decisive Role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Beat Issue Brief*. <<http://www.nyu.edu/globalbeat/pubs/ib24.html>>

55. 陳鐵民，*社會發展理論模式研究：兼論鄧小平現代化理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1999），頁43。

56. Johnston, Alastair I.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2003), pp. 5~9; pp.50~56.

57. 當然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所得收入的差異過大也是造成此傾向的原因。

58. Johnston, Alastair I. (2003), p. 48.



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必須在經濟上要有維持發展與保障成果的能力，有一套專屬於自己的經濟安全戰略。⁵⁹

伍、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評析

國際政治的多極化和經濟貿易的全球化發展趨勢，給予世界和平帶來了機遇和有利條件。中國有效的掌握了此一時代脈動，獲得了發展的契機，並在客觀上逐漸成為具有全球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大國。由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表明，中國的崛起對於週邊國家和世界其他地區來說是一個正向的助力，是一個穩定的力量。關於此點可由前述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表現及國際間的評價得到印證。但在另一方面，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形勢詭譎多變，國際關係中的強權政治、單邊主義、訴諸武力解決爭端的傾向重現，這無疑對世界和平及國家間的合作關係形成威脅。同時也可能使經濟「互賴」的關係與成果被毀於一旦。

因此，吾人認為中國必須小心謹慎的處理目前「互賴」過程中日益浮現的難題（特別是隨著「互賴」程度的深化，所可能致生的磨擦），同時積極承擔一個大國應付之責任，避免與其他國家產生衝突，危害了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機遇。

一、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意義與成效

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的意義為何，或可由以下幾項優點予以說明：

(1)獲取貿易利益：這裡不單係指藉由出口貿易所獲得的外匯增加，還包括了因進口貿易取得的收益。⁶⁰開放後的中國市場，人

59. 鄭通漢，*經濟全球化中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北京：國防大學出版，1999），頁3-5。

60. Cass, Deborah Z. *China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Entering the New Millenniu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07.



民能用較少的錢買到質與量較優的產品，使得消費者福利增加。

(2)利用多邊機制解決爭端：過去中國傾向用雙邊談判解決貿易糾紛，但這並非最好的方法。在多邊為主體的經濟建制中，往往設有一權威機構，由其解決成員間的爭端，不但效率高且易於執行。⁶¹

(3)參與制定經貿「規範」：以世貿組織為例，國家必須在其下次談判正式開始之前，即申請加入獲准，否則無權參加談判，只能在談判結束後被動地接受結果。若不願接受，則可能在國際經貿活動中受到諸多的不便與不利。⁶²

(4)加速改革的腳步：中國現在需要建立與穩定新一代的企業制度、金融制度，但是在具體實施上有許多相左的意見。透過與國際接軌，用外部壓力加速改革，可以說是爭議較少而效果最佳的方法。⁶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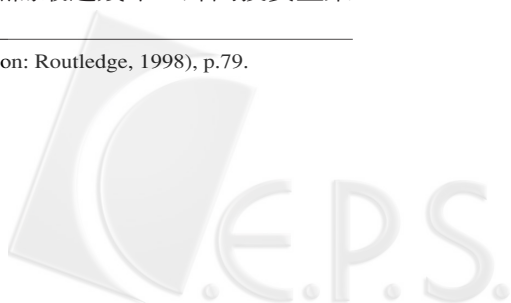
除了上述優點外，參與「國際經濟建制」後的中國市場自2001年以來，所吸收的外資持續大幅增加。2001年整年的外商投資契約金額為六百九十一億九千一百萬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為四百六十八億四千六百萬美元，比2000年分別增長了10.43%和14.9%。2002年，在中國吸引外資持續增加的同時，全球跨國投資金額正處於下降的狀況，依照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的評估，美國吸引的外資金額已經下降到四百五十億美元左右，而中國則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約佔全球跨國投資金額的9%。

在吸引外商投資的過程中，以往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並不引進其母公司的先進技術，然而最近幾年，外商投資企業

61. Howse, Robert.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998), p.79.

62. Holbig, Heike. (2002), p. 39.

63. Cass, Deborah Z.(2003), p. 256.



向中國轉移先進技術的比率開始增加。以2001年為例，有42%的企業使用其母公司先進的技術在中國從事生產。⁶⁴到了2002年，更有高達五分之四以上的新投資項目，採用了外資母公司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在中國進行生產。⁶⁵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以吸引跨國公司參與大型國有企業改革的國家經濟政策日益明確。大型跨國公司參與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不僅提供巨額投資，而且他們多面的行銷管道、先進的經營觀念與技術等各種資源也將一併融入國有企業之中。⁶⁶因此，會使大型國有企業推動全方位的變革，一方面增加與其他企業的競爭力，一方面吸引更多外資。中國國資委員會主任李榮融曾表示，中國要適應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趨勢，發展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必須使劣質企業儘快退出市場，支援引導外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與大型國有企業的重組與改革。⁶⁷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去年11月6日開幕的「世界經濟發展宣言大會暨中國企業高峰會」上表示，中國將積極引導外商投資企業參與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在題為「互利合作 加快發展 共創輝煌」的演講中，吳儀表示：中國將積極引導外商投資企業參與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捉住新一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時機，大量吸引國際資本、技術和人才，形成具有規模效應的產業帶和產業群，充分發揮產業聚集效應、輻射效應，以及對區域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快速帶動作用。⁶⁸

64. 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2），頁47。

65. 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頁49。

66. 林葉，**中國跨國公司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1992），頁14~15。

67. 「跨國企業的技術轉移為中國帶來什麼？」，**中國輕工機械網**。〈http://www.clima.org.cn/news_html/articles/1/2186.html〉

68. 「互利合作加快發展共創輝煌」，**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3-11/07>〉



改革開放及參與「國際經濟建制」之前的中國，無論是經濟條件與經濟環境均令外資感到怯步。這種情形一直到中國「入世」之前，並未有太大的改善，由於經濟體制的透明度不足，使得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抱持著觀望的態度。「入世」之後，由於外商預期中國將會遵守WTO的各項規則，而這些規則正是外商所熟悉並認為能保障他們商業利益的保護身符，加上中國市場廣大的需求量、低成本的勞動市場，促使外資的投資比例逐漸上升。除了外資流入加快，固定資產的投資也有所增加，目前外商投資及跨國企業對於中國經濟的成長已佔據重要地位，而且改變了中國經濟成長的方式和質量。⁶⁹

總的說來，雖然中國已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中國經濟仍存在許多矛盾和問題，包括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企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不高，體制性障礙仍制約著經濟發展，以及官員的貪汙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依賴體制面的改革，建立市場化經濟體制才有可能解決。同時也唯有透過市場機制，才能優化產業結構，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激烈的競爭。

二、融入「國際經濟建制」的困境與挑戰：貿易與和平vs.貿易與戰爭

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對中國本身而言有莫大的意義，對於區域和世界的穩定也同樣具有著關連性。依據「貿易和平論」(the theory of trade, 或稱：「經濟互賴和平論」,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ory) 的觀點，國家間藉由經濟與貿易所產生的「互賴」關係，既包含有促進和平的因素，也包含有導致衝突的可能。本部分具體分析經濟「互賴」的性質與條件，從而發現經濟「互賴」雖然是中國經濟得以發展和崛起的一項助力，但同時也是中國未來與其

69. 馮雷、江小涓，「2002~2003年中國對外經貿形勢分析與政策建議」，江小涓主編，*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87。



他國家發生衝突的危險因子。

(一)「貿易和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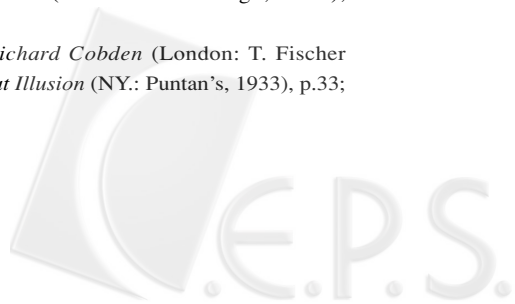
對經濟與和平關係的探討，可追溯至十七世紀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根據早期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自由貿易理論，貿易之所以產生，就在於交易的每一方都能從貿易中獲利，無論個人之間、公司之間、區域之間，還是國家之間都是如此。反觀戰爭，即使是勝利者也不會從中獲利，充其量不過是勝者的損失小於敗者。所以，按照早期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的看法，藉戰爭手段來獲取財富是不可能的。相反地，自由貿易則被視為一項取得財富的有效方法，無需耗費過多，便能得到與戰爭同樣甚至是超過的利益。此一觀點即演變成為後來「貿易和平論」的基礎。⁷⁰

「貿易和平論」的創始人科布登 (Richard Cobden) 承襲了史密斯和李嘉圖的自由貿易理論，提出了自由貿易與和平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內在關係。依據他的觀點，自由貿易對於每個參與的國家具有一種「聯合的」(united) 作用，使得每一方同等程度地熱衷於尋求給對方帶來繁榮。換句話說，戰爭或衝突爆發的可能性相對地下降。⁷¹

關於貿易會帶來和平的觀點，學者安吉爾 (Norman Angell) 除了肯定科布登的貿易「聯合」作用外，進一步由比較成本的角度，論證貿易與和平的關係。他指出，隨著經濟相互依賴的深化，每個國家都將面臨一種選擇，即選擇和平貿易的新思維，或是選擇「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 的舊方法。他認為，雖然戰爭在過去

70. Overbeek, Henk. *Restructuring Hegemon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Neo-Liberalism in the 1980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144~145.

71. Cobden, Richard.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ichard Cobden* (London: T. Fischer Unwin, 1903), p. 225; Angell, Norman. *The Great Illusion* (NY: Puntan's, 1933), p.33; p. 256.



的歷史上被證明是有利可圖，但由於現代戰爭具有破壞貿易「聯合」作用的能力，因此選擇戰爭無於是一種自殘的行徑。國家決策者若能明白，與貿易相比戰爭是無利可圖的，則和平就有可能實現。⁷²

冷戰時代，「經濟互賴和平論」的觀點被美國學者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進一步加以完善。他把國家分成兩種類型，一是以商業促進福利的貿易國家；一是靠軍事擴張國力的領土國家。他認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相互依賴關係的存在，會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成為貿易國家，在高度依賴的國際體系之下，發動戰爭的原因就不易存在。因為戰爭不僅成本過高，而且國家本來可以從貿易中獲得的利益，也可能因為戰爭而失去。⁷³

到了二十世紀的七〇年代，「互賴」理論獲得了發揚，羅斯克蘭斯借用了這一理論的精神，輔以「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s）和「調整成本」（costs of adjustment）的概念，⁷⁴由「互賴」條件下收益和成本的比較視角切入。他認為一個依賴度較高或開放性較大的國家，「機會成本」可能相當大，而「機會成本」越大，這個國家因切斷對外經濟聯繫所受到的經濟損失就越大。這是因為除了承受巨大的「機會成本」外，國家還必須支付重新建立國民經濟體系而導致的「調整成本」。所以，這些國家不傾向於輕易發起破壞彼此經濟關係的戰爭。⁷⁵

72. Angell, Norman. (1933), pp. 87~89.

73. Rosecrance, Richard N.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Y.: Basic Books, 1986), pp.13~14; pp.24~25; Rosecrance, Richard N. "War, Trade and Interdependence," in Rosenau, James N., and Tromp, Hylke. edit-ed.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Aldershot, U.K.: Avebury, 1989), pp. 48~57.

74. 所謂「機會成本」是一個國家因停止自由貿易而失去從自由貿易中獲得收益的成本。而「調整成本」，是指貿易活動停止後重新調整國家經濟而付出的成本。

75. Rosecrance, Richard. (1986), pp. 24~25; p.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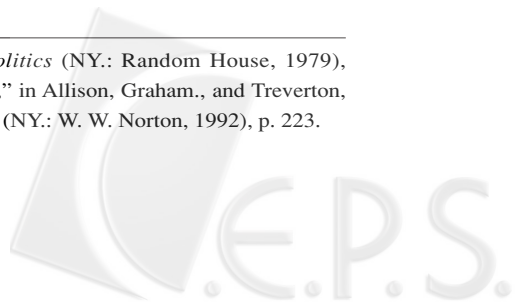
(二) 對「貿易和平論」的質疑與修正

經濟上的「互賴」能夠創造和平的說法，其核心是因貿易而產生的「聯合」作用，讓具有依賴性的國家因為擔心這種「聯合」作用的消失而使經濟利益減損，所以不願發動戰爭。從根本上看，這是假設國家與決策者是理性的，能衡量利益的和諧與精密的計算外交政策的成本。然而，經濟上的「互賴」與和平的關係果真是如此單純嗎？

對此，現實主義學派提出了一些質疑，首先是針對該理論所忽略的「互賴」脆弱性問題，也就是相互依賴的各方獲得可替代選擇的能力。國與國在貿易中斷的情況下，獲得可替代性選擇的能力有高有低。在現實主義看來，「無政府狀態」對國家的影響是根本性的。一國從自己的安全利益考量，對相互依賴並非總是歡迎；相反的，隨著相互依賴的增加，國家會擔心由於依賴過強而影響到自身的安全，這特別是對於那些過分依賴石油或是生產原料的國家。根據現實主義的分析，這種不斷增加的擔心，會促使這些國家設法減輕依賴度，進而造成他們設法控制貿易資源的帝國主義行為。⁷⁶若是依照這個邏輯，相互依賴很可能引發更大的安全競爭，其結果反而是不利於和平。

面對現實主義學派的質疑，主張「貿易和平論」者，開始對該理論提出了一些修正：(1)將經濟「互賴」與國際制度相結合，就理論而言，由於相互依賴關係中存在著需求被中斷的風險，導致交往的成本過高，因此「互賴」關係中的國家為了共同的利益，可以借助雙邊、多邊的制度安排，來調整國家間的關係，保證「互賴」雙方能安全而持久的獲益。正如學者哈斯（Ernst Hass）所說：由

76.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Random House, 1979), p.106; Mearsheimer, John J. "Disorder Restored," in Allison, Graham., and Treverton, Gregory F. edited.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NY.: W. W. Norton, 1992), p. 223.



於處於相互依賴的各方意識到發生衝突的代價太高，因而成員間為管理和限制利益衝突的情況發生，會促進與達成一系列的安排。⁷⁷此外，學者奈伊（Joseph Nye）指出，一個有效的制度可以從四個方面穩定國家的預期心理：使行為者明白維繫行為連續性的價值、提供互惠的機會與可能、增加資訊的流動與透明度、提供解決衝突的方法與機制。⁷⁸簡單的說，經濟「互賴」與國際制度相結合，為國家間關係的穩定奠定了更深一層的基礎。因此有學者認為，關於國際合作的理論現在已經超越了相互依賴，而發展到用來解釋國際建制與制度能減少戰爭發生的可能性。⁷⁹(2)將經濟「互賴」與國家對未來貿易的預期相結合。「貿易預期理論」（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認為，相互依賴的程度加上對未來貿易的預期，可以對一國是否具有發動戰爭的意圖作出預測。⁸⁰此一觀點的推論是一國在決定戰爭或和平時，不會簡單的只考慮當下的貿易利益和「調整成本」，還必須考慮貿易的預期價值。一個處於高度依賴狀態下的國家，儘管當下的貿易情況良好，但由於對未來貿易預期低，所以會選擇發動戰爭。相反地，一個國家雖然現在的貿易情況不佳，但因為對未來的貿易預期看好，使得國家願意保持「互賴」關係或是短暫的不利益，而謀求長遠的利益，維持和平的延續。

（三）分析

「貿易和平論」因為與二次戰後世界的長期和平以及國家間經

77. Hass, Ernst B. "Words Can Hurt You, or, Who Said What to Whom About Regimes," in Krasner, Stephen D. edit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3.

78. Nye, Jr., Joseph S.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Y.: Longman, 2000), p. 39.

79. Lynn-Jones, Sean M. *The Cold War and Af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1), p. x.

80. Copeland, Dale 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4 (1996), pp. 475-498.



濟關係的「互賴」發展比較符合，而具有解釋國際現象的一定影響力。但是經濟上的「互賴」究竟是利於創造和平還是易於引發戰爭呢？

由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日漸興盛，各國在經濟上相互依賴度加深，使得經濟關係成為國際關係中不可忽視的一環。「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已逐漸成為傳統地緣政治學研究的核心，被大量用來分析國際事務，而經貿外交也成為大國之間外交的重點。⁸¹因此，確如「貿易和平論」所言，在一些重視雙邊和多邊貿易，而且經濟相互依賴程度較高的國家之間，貿易利益的考慮是制約戰爭爆發的重要因素，至少在領導者下決策時，貿易及相關經濟利益是一個重要的參數。為了政治原因而損害貿易利益，畢竟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一項沈重的代價。如果再考慮當前高科技下戰爭帶來的嚴重破壞力與成本，國家是非常可能為了保持貿易關係而設法回避戰爭或衝突。故而，隨著全球經貿關係聯繫的增強，各國之間在經濟上的交流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軟化了政治的分歧，促進了和平的實現。即便是對「貿易和平論」提出批評的現實主義，⁸²也不得不承認當前的國家通常是選擇合作與國際分工來獲得更多的利益，而非戰爭。⁸³

雖然相互依賴的發展確實有加強國家間共同利益的形成，從而促使國家尋找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彼此的衝突。但這並非表示只要國家間存在相互依賴關係，國際間的和平就能得到保障！因為對一個

81. Womack, Brantly. "Sino-Indian Border Trade for Frontier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India's North-East and China's South-West," presented for *The South Asia Research Society Seminar on Facilitation of Trade and Transport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Kolkatta: South Asia Research Society, November 27~28, 2003).

82. 例如：有評論認為十九世紀古典自由主義主張的貿易能創造和平的觀點，是過於簡單而無信譽的。Lynn-Jones, Sean M. (1991).

83.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22~225.



國家而言，貿易的利益是否超過經濟上相互依賴的成本，關鍵是決定於貿易關係是否對稱。在不對稱的貿易關係中，依賴性較強的國家因為處於一個相對不利的貿易格局中，並可能受制於依賴性較小的他方，此時相互依賴關係中的貿易給它帶來的不是利益的獲得而是成本的付出。正如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所說，在行為體交往過程中，最有可能對行為體形成影響力的就是依賴關係中所存在的不對稱狀況。從不對稱關係中獲利的國家常常享有經濟上、政治上的優勢。而且依賴性較少的行為體經常可能把「互賴」關係作為一種談判時的籌碼。⁸⁴因此，若從這方面來理解，在相互依賴關係中，貿易關係的不對稱往往是導致衝突的重要原因。

其次相互依賴意味著國家自主權在某種程度上的弱化。因為所謂的「互賴」就是產生於交往過程中彼此都付出代價的時候，若彼此交往間不會產生付出重大代價的結果時，只存在著相互往來。⁸⁵國家自主權的削弱是相互依賴的一個特點，這可能會促使一些國家為尋求自主權或為保衛其基於「互賴」的利益而不惜使用武力。⁸⁶事實上，在一個相互依賴現象盛行的國際關係中，國家依舊是最重要的行為主體，國家對利益的追求依舊是「互賴」關係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因此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仍就是追求和保護國家利益的有效選項。換句話說，戰爭是不可能被完全避免的。這特別是在一國認為它從戰爭中得到的利益要比付出的成本多，或者是戰爭給敵國造成的損失要比自己遭受的大，此時戰爭不但是可能的選擇而且也符合理性的決策模式。例如：1982年阿根廷出兵福克蘭群島與英國開戰，儘管該場戰役毫無疑問的會損害阿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

84. Keohane, Robert O., and Nye, Joseph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Y.: Longman, 2001), pp. 9-11.

85. Keohane, Robert O., and Nye, Joseph S. (2001), p.11.

86. 吉爾平（Robert Gilpin）著，楊宇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台北：桂冠出版，1994），頁439-440。



係，為其帶來經濟上的不利益，但是戰爭移轉了國家統治權爭奪的危機。⁸⁷

(四) 小結

對所有國家而言，保證自己的政治和安全利益是獲取經濟利益的先決條件。試想如果一個國家連自己的安全都無法確保，又如何能放心的去追求經濟上的利益及發展。當然，獲取經濟利益可以增加國家的經濟實力，進而增強國家保障安全的能力，但當國家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脅時，將經濟利益置於次要，不惜訴諸武力的決定，也的確是十分正常而合理的。

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和與西方國家的「互賴」情形看來，中國如果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或是戰爭，絕對是要付出高昂的「機會成本」與「調整成本」的。但如果衝突是涉及到一些觸及中國核心利益的領域，例如：台灣的統一問題、南海主權的問題等，則很難保證中國政府不會斷然採取強硬措施，甚至是軍事上的手段。即便這必然會招致美國的介入而與中國產生對抗，會嚴重影響中國本身現有的發展與經濟利益，同時也會破壞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經貿合作關係。⁸⁸

陸、結論

1977年，毛澤東去世一年後，鄧小平重新掌權。自那時起，中國的大戰略從追求「革命」轉向尋求「現代化」。此一國家目標的調整，代表著中國後革命時代的開始。鄧小平在1978年的一次講話

87. Wolfson, Murra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Boston, Mass.: Kluwer, 1998), p.153; Hastings, Simon. *Chronicle of the Falklands (Malvinas) History and War of 1982* (NY.: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4), pp. 27~29.

88. Yates, Stephen J. "China's Taiwan White Paper Power Pla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loader.cfm?url=/commonspot/security/getfile.cfm&PageID=10320>>



中指出：只有把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才能有效地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對付外國侵略者。⁸⁹從1980年開始，鄧小平為中國往後的十年提出了三個主要努力的目標，其中之一便是「四個現代化建設」，並把這個目標視為中國解決國際問題、渡過國內困境的先決條件。⁹⁰在鄧小平的開啟與領導下，中國經歷了一系列的國內經濟改革，這些改革措施推動著北京在對外政策上逐漸朝向對國際社會開放，其具體表現為：從倡導世界革命轉為追求和平的國際環境、從不信任與不加入國際建制到積極參與和融入，甚至是主導、從強調政治和軍事建設到把精力集中於經濟「現代化」。

隨著時間進入1990年代，東亞經濟開始陷入困境。首先是日本經濟從1990年代初開始呈現衰退，至今仍未明顯好轉。197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席捲了整個區域，到了2000年東亞地區才剛要從金融危機谷底逐漸攀升時，美、日、歐的經濟情勢卻開始下滑，使得東亞的經濟增長又進入嚴冬。這種現象影響了區域國家人民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同樣期間內獲得發展和崛起的中國。經濟成長率一枝獨秀，外商投資比率逐年增加，對中國而言，這是實施經濟改革與「現代化」的成果，人民的生活水準提升，物質條件也有了改善。同時中國也在逐步融入國際建制和參與多邊形式的國際組織過程中，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大國，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就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發達與崛起卻對某些國家帶來威脅。中國在經濟改革成功的基礎上，積極進行國防「現代化」，國力迅速提升，對鄰近國家造成極大的不安全感。「中國威脅論」不僅代表著亞太區域內國家，對於

89.「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安徽省經濟貿易委員會。http://www.ahetc.gov.cn/dangwei/d_wxuan/2_17.htm

90.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周村區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zhoucun.gov.cn/dangjian/zhuzuo/d007.htm>



中國這個新興強權的憂慮，同時也是美國在亞太戰略布局上的一個衝擊。對此，近年來美國又重新出現「圍堵」中共的論述，⁹¹而大部分亞太國家的立場，則是發展出一套結合經濟開放與戰略「圍堵」的策略；也就是，在汲取中國利益的同時，設法降低或控制中共對區域和平的威脅。⁹²這種左手「接觸」，右手「圍堵」的政策，差異不在於其互斥的關係，而是強調根據實際發展的需要，作出彈性與階段性的因應之道。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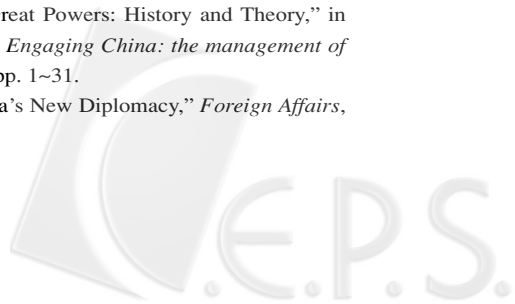
在經濟改革的推動下，中國開始與世界接軌，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與合作可能，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拋棄了對國際「規範」的仇視，積極參與和融入各項國際制度與組織，尤其是「國際經濟建制」。⁹⁴透過貿易的往來和外國企業在中國的設廠與投資，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相互依賴度日增。依照「貿易和平論」的觀點，國家間會因為貿易而產生一種「聯合」作用，在彼此間形成共同的利益。一方面，使得每一方向等程度地熱衷於尋求給對方帶來繁榮；另一方面，讓具有依賴性的國家因為擔心這種「聯合」作用的消失而使經濟利益減損，以致不願發動戰爭。據此，當前的中國將不會是一個傾向使用武力或是改變現有國際規則的國家，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僅是誇大且過於悲觀的看法。

91. Litwak, Robert. *Rogue States and U.S. Foreign Policy: Containment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Wilson Center Pre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24~239; Lieberthal, Kenneth.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www.brook.edu/comm/policybriefs/pb072.htm>>

92. Acharya, Amitav. "Containment, Engagement, or Counter-dominance?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in Johnston, Alastair I., and Ross, Robert S. edit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129~151.

93. Schweller, Randall L.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Johnston, Alastair I., and Ross, Robert S. edit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1~31.

94. Medeiros, Evan S., and Fravel, M. Taylor.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6 (2003), pp. 22~35.



然而，在進一步分析貿易「互賴」與和平及戰爭的關係後，本文認為經濟「互賴」中的貿易關係是否對稱，是一項決定國家間未來是否發生衝突的關鍵因素。在不對稱的貿易關係中，依賴性較強的國家因為處於一個相對不利的結構，並可能受制於依賴性較小的他方，使得相互依賴關係中的貿易對前者而言，給它帶來的不是利益的獲得而是成本的付出。其次，「互賴」關係中國家自主權的削弱是另一項可能導致衝突的因素，因為國家可能會為了尋求自主權或為保衛其基於「互賴」的利益而不惜使用武力。因此，若從以上兩點來理解，中國確實有可能是造成區域乃至於世界不穩定的威脅。⁹⁵

面對上述的困境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心中的憂慮，中國應如何沈著面對，以求在保持現有的經濟建設成果之餘，繼續朝向「現代化」建設的「第三步」？⁹⁶本文提出下列幾點作為參考：(1)以追求和平為前提的崛起。中國在崛起的同時，應明白表達追求和平的善意與真誠，回避霸權主義行徑，強調其在亞洲所扮演的穩定角色，消除外界疑慮，並主動向國際社會特別是周邊國家做解疑釋惑的工作，爭取各方面的理解和信任；(2)強化與東亞國家之間的互利合作。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經濟上利益，展現出中國在將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地位與功能。中國對東亞提供的市場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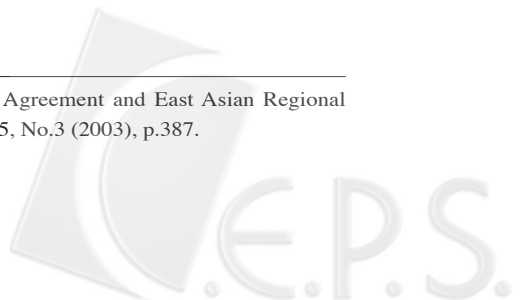
95. 中國雖然比過去較傾向於現狀，但這不代表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就變得較為良善而不會使用武力解決問題，或是未來不會有所改變。因為即使是一個安於現狀的國家，如果在遭遇到攸關存亡的安全困境時，恐怕也會傾向藉由武力來保衛領土和勢力範圍。因此，未來有兩點是吾人應高度關注的問題，一是中國內部的社會與政治情況是否穩定；一是中美間可能升高為實際衝突的安全困境成因（特別是台灣問題）。Johnston, Alastair I. (2003), pp. 52~56.

96. 所謂的「現代化」建設「三步走」係指：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經超過日本，中國在東亞合作中也具有穩定大局和人心的作用。在近幾年的東亞領導人相關會議上，中國所提出的二十多項合作方案，應是未來繼續努力與推動的重點；⁹⁷(3)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安鄰：積極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堅持透過對話合作增進互信，透過和平談判解決分歧；富鄰：加強與鄰國的互利合作，深化區域內合作機制的形成，促進經濟整合，與亞洲各國一同進步與繁榮；(4)大國與周邊外交雙軌併行。隨著國力的不斷壯大和融入國際體系速度的加快，中國越來越重視與發達國家的關係，逐步提高了大國外交的地位，同時也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增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新世紀以來，「大國外交是關鍵、周邊外交是首要、發展中國家外交是基礎」的多方外交政策已經確立，現在中國應擔負起大國責任，透過國際合作，來促進國際經濟發展與強化世界和平。

當前的中國相較於歷史上的任何一段期間，是更為融入國際建制，並且積極地與區域或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合作。但這不意謂著經濟上的「互賴」將使得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就不會與他國發生衝突。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建制」固然取得了發展與繁榮，但是同時也面對了挑戰和未知。展望新世紀，和平崛起應是中國邁向大國應有的認知與策略。

97. Cai, Kevin G. "The ASE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Group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3 (2003), p.387.



參考書目

一、中文

- 「互利合作加快發展共創輝煌」，**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3-11/07>>
- 「國家統計局報告」，**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10-03/26/228946.html>>
- 「新中國50年系列分析報告之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輝煌」，**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gb/index.htm>>
- 「溫家寶談台灣和西藏問題等」，**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http://www.zyztzb.cn/zyztzbwz/newscenter/zhongyaoyan-lun/80200311250074.htm>>
- 「跨國企業的技術轉移為中國帶來什麼？」，**中國輕工機械網**。<http://www.clima.org.cn/news_html/articles/1/2186.html>
-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安徽省經濟貿易委員會**。<http://www.ahetc.gov.cn/dangwei/d_wxuan/2_17.htm>
- 「鄧小平視南巡講話」，**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www1.people.com.cn/GB/33831/33837/2535034.html>>
- 王小魯、樊綱主編，**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 王小魯、樊綱，**中國地區差距：20年變化趨勢和影響因素**（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 王懷超，「中國政治體制改革24年」，**理論動態**，第一五九五期（2003），頁14~27。
- 伊銘，「中共新的權力三角」，**早報網**。<<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ongress16/pages/congress16151102g.html>>



吉爾平 (Robert Gilpin) 著，楊宇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台北：桂冠出版，1994)。

朱蓓蕾，「中國大陸的制度轉型與社會變遷面臨之問題」，**遠景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2000)，頁79~84。

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2)。

江小涓主編，**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報告 (No. 1: 2002~2003)**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林葉，**中國跨國公司論**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1992)。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 (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施哲雄主編，**發現當代中國** (台北：揚智文化，2003)。

孫健，**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制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徐小鳳，「三個代表與政治改革中的兩個問題」，**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二期 (2003)，頁12。

陳鐵民，**社會發展理論模式研究：兼論鄧小平現代化理論**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1999)。

曾培炎，**新中國經濟50年** (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馮雷、江小涓，「2002~2003年中國對外經貿形勢分析與政策建議」，江小涓主編，**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報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87。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 (台北：元旦出版，1999)。

趙建東，「中國的貿易和機遇」，發表於**2004中國貿易出口金融研討會** (上海：全球貿易評論主辦，2004年6月1日)。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中國科學院**。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12/25/0112.htm>>



鄭永年，**政治漸進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台北：吉虹資訊，2000）。

鄭通漢，**經濟全球化中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北京：國防大學出版，1999）。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周村區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zhoucun.gov.cn/dangjian/zhuzuo/d007.htm>>

邊裕淵，「中國大陸金融深化之研究」，**遠景季刊**，第五卷第二期（2004），頁3~28。

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1）。

二、英文

“Final Report on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rade Knowledge Network*. <http://www.tradeknowledgenetwork.org/pdf/tkn_china_final.pdf>

“Swedish Trade Policy,” *SWEDEN.SE*. <www.sweden.se/templates/FactSheet___6366.asp>

Acharya, Amitav. “Containment, Engagement, or Counter-dominance?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in Johnston, Alastair I., and Ross, Robert S. edit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129~151.

Allison, Graham., and Treverton, Gregory F. edited.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NY.: W. W. Norton, 1992).

Angell, Norman. *The Great Illusion* (NY.: Puntan’s, 1933).

Axelrod, Robert M.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Y: Basic Books, 1984).

Bernstein, Richard., and Munro, Ross H.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Random House Date Published, 1998).

- Breslin, Shaun. "Chin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From Plan to What?'"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http://www.psa.ac.uk/cps/1995%5Cbres.pdf>>
- Cai, Kevin G. "The ASE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Group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3 (2003), pp.387~404.
- Calder, Kent E. "Asia's Empty Tank,"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2 (1996), pp. 55~69.
- Cass, Deborah Z. *China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Entering the New Millenniu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hen, Feng. *Economic Transili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Ideology and Refor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 , "An Unfinished Battle in China: The Leftist Criticism of the Reform and the Third Thought Emancip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158 (1999), pp. 447~467.
-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5 (1996), pp. 40~52.
- Cobden, Richard.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ichard Cobden* (London: T. Fischer Unwin, 1903).
- Copeland, Dale 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4 (1996), pp. 475~498.
-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Survey: Business in China, Behind the Mask Mar," *Economist.com*. <http://www.economist.com/displaystory.cfm?story_id=2495113>
- Gilboy, George J.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83, No.4 (2004), pp. 33~48.



-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Hale, David., and Hale, Lyric H.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6 (2003), pp. 36~53.
- Halloran, Richard. "China's Decisive Role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Beat Issue Brief*. <<http://www.nyu.edu/globalbeat/pubs/ib24.html>>
- Hastings, Simon. *Chronicle of the Falklands (Malvinas) History and War of 1982* (NY.: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4).
- Holbig, Heik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2).
- Howse, Robert.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998).
- Itoh, Fumio.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Johnston, Alastair I.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2003), pp. 5~56.
- Johnston, Alastair I., and Ross, Robert 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Y.: Routledge, 1999).
- Keohane, Robert O., and Nye, Joseph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Y.: Longman, 2001).
- Krasner, Stephen D. edit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Li, Cheng. "China's Political Succession: Four Myths in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http://www.fpif.org/commentary/2001/0105chinamyths_body.html>
- Li, Ling.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Cato Journal*, No. 18 (1998), pp. 147~151.
- Lieberthal, Kenneth.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www.brook.edu/comm/policybriefs/pb72.htm>>

Litwak, Robert. *Rogue States and U.S. Foreign Policy: Containment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Wilson Center Pre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Liu, Henry C K. "The Struggle for Harmony, Part 2: Imagined danger," *Asia Times*.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EF14Ad02.html>>

Lynn-Jones, Sean M. *The Cold War and Af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1).

Medeiros, Evan S., and Fravel, M. Taylor.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6 (2003), pp. 22~35.

Nye, Jr., Joseph S.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Y.: Longman, 2000).

Overbeek, Henk. *Restructuring Hegemon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Neo-Liberalism in the 1980s* (London: Routledge,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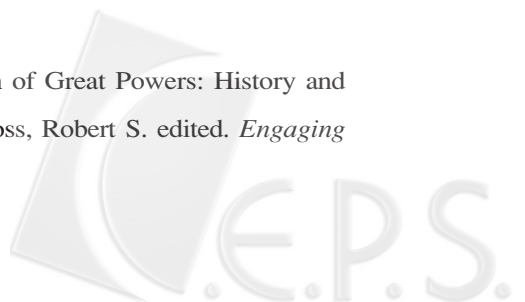
Pesek Jr., William. "China's own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aipei Times* (Monday, Mar 17, 2003).

Pumphrey, Carolyn W. edited. *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Rosecrance, Richard N.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Y.: Basic Books, 1986).

-----, "War, Trade and Interdependence," in Rosenau, James N., and Tromp, Hylke. edited.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Aldershot, U.K.: Avebury, 1989), pp. 48~57.

Schweller, Randall L. "Managing the Rish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Johnston, Alastair I., and Ross, Robert S. edit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1~31.

Stein, Arthur A.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Tien, Charles., and Nathan, James A. “The Polls-Trends: American Ambivalence toward Chin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5, No.1 (2001), pp. 130~133.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Random House, 1979).

Wolfson, Murra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Boston, Mass.: Kluwer, 1998).

Womack, Brantly. “Sino-Indian Border Trade for Frontier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India’s North-Ease and China’s South-West,” presented for *The South Asia Research Society Seminar on Facilitation of Trade and Transport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Kolkatta: South Asia Research Society, November 27~28, 2003).

Yates, Stephen J. “China’s Taiwan White Paper Power Pla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loader.cfm?url=/commonspot/security/getfile.cfm&PageID=10320>>

Zhang, Allan. “China’s New Leadership Rolls Out Its Reform Agenda,” *PricewaterhouseCoopers*. <<http://www.pwc.com/extweb/newcolth.nsf/0/CE98119E9205D7D985256E2800760ABE?OpenDocument>>



聯絡作者：

住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E-mail：smju@nccu.edu.tw（朱新民）

jakobs@mail2000.com.tw（譚偉恩）

收稿日期：2004/11/11

審查通過：2004/11/26

責任編輯：林家彰

